

俄国史译丛·历史与文化

Серия переводов книг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 欧洲中世纪史 (第二卷)

ИСТОРИЯ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 (Том II)

[俄] С.П.卡尔波夫 / 主编

С.П.Карпов

逯红梅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欧洲中世纪史 (第二卷)

俄] С.П. 卡尔波夫 / 主编  
*С.П. Карпов*

逯红梅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中世纪史. 第二卷 / (俄罗斯) 卡尔波夫主编;  
逯红梅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3

(俄国史译丛)

ISBN 978 - 7 - 5201 - 4201 - 4

I. ①欧… II. ①卡… ②逯… III. ①欧洲 - 中世纪  
史 IV. ①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3836 号

· 俄国史译丛 ·

## 欧洲中世纪史 (第二卷)

---

主 编 / [俄] С. П. 卡尔波夫

译 者 / 逯红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高 雁

责任编辑 / 高 雁 肖世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43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201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8 - 3030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主编简介

**С. П. 卡尔波夫**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博士，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拜占庭学知名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拜占庭历史。出版专著、教科书十余部，发表文章近百篇，主持各类基金项目十余项。

## 译者简介

**逯红梅** 历史学博士，文学硕士。目前在长春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工作，俄语翻译。曾在《城市晚报》任记者。主要研究领域：俄国经济史、社会史。发表论文和译文多篇。

## 总序

我们之所以组织翻译这套“俄国史译丛”，一是由于我们长期从事俄国史研究，深感国内俄国史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学界的需要，而且国内学者翻译俄罗斯史学家的相关著述过少，不利于我们了解、吸纳和借鉴俄罗斯学者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选择地翻译数十册俄国史方面的著作，既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俄国史的过程，还是鞭策我们不断进取的过程、培养人才和锻炼队伍的过程，也是为国内俄国史研究添砖加瓦的过程。

二是由于吉林大学俄国史研究团队（以下简称“我们团队”）与俄罗斯史学家的交往十分密切，团队成员都有赴俄进修或攻读学位的机会，每年都有多次赴俄参加学术会议，每年请2~3位俄罗斯史学家来校讲学。我们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世界史所、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所、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等单位学术联系频繁，有能力、有机会与俄学者交流译书之事，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俄同行的理解和支持。以前我们翻译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的著作时就得到了其真诚帮助，此次又得到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大力支持，而这是我们顺利无偿取得系列书外文版权的重要条件。舍此，“俄国史译丛”工作无从谈起。

三是由于我们团队得到了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党委书记杨振斌、学校职能部门和东北亚研究院的鼎力支持和帮助。2015年5月5日李元元校长访问莫斯科大学期间，与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В. А. Садовничий）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卡尔波夫教授，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鲍罗德金教授等就加强两校学术合作与交流达成重要共识，

李元元校长明确表示吉林大学将大力扶植俄国史研究，为我方翻译莫斯科大学学者的著作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萨多夫尼奇校长非常欣赏吉林大学的举措，责成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全力配合我方的相关工作。吉林大学主管文科科研的副校长吴振武教授、社科处霍志刚处长非常重视我们团队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合作，2015年尽管经费很紧张，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科研经费。2016年又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经费。这一经费支持将持续若干年。

我们团队所在的东北亚研究院建院伊始，就尽一切可能扶持我们团队的发展。现任院长于潇教授在上任以来3年时间里，一直关怀、鼓励和帮助我们团队，一直鼓励我们不仅立足国内，而且要不断与俄罗斯同行开展各种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我们团队在国内外的影响。在2015年我们团队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新一轮合作中，于潇院长积极帮助我们协调校内有关职能部门，与我们一起起草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合作方案（2015~2020年），获得了学校的支持。2015年11月16日，于潇院长与来访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卡尔波夫院士签署了《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合作方案（2015~2020年）》，两校学术合作与交流进入了新阶段，其中，我们团队拟4年内翻译莫斯科大学学者30种左右学术著作的工作正式启动。学校职能部门和东北亚研究院的大力支持是我们团队翻译出版“俄国史译丛”的根本保障。于潇院长为我们团队补充人员和提供一定的经费使我们更有信心完成上述任务。

2016年7月5日，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教授率团参加在莫斯科大学举办的中俄大学校长峰会，于潇院长和张广翔等随团参加。会议期间，杨振斌书记与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院士签署了吉林大学与莫斯科大学共建历史学中心的协议。会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卡尔波夫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杜奇科夫（И. И. Тучков）教授（2015年11月底任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鲍罗德金教授陪同杨振斌书记一行拜访了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院士，双方围绕共建历史学中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力地助推了我们团队翻译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者学术著作一事。

四是由于我们团队同莫斯科大学历史系长期的学术联系。我们团队与莫

斯科大学历史系交往渊源很深，李春隆教授、崔志宏副教授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攻读了副博士学位，张广翔教授、雷丽平教授和杨翠红教授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进修，其中张广翔教授三度在该系进修，与该系鲍维金教授、费多罗夫教授、卡尔波夫院士、米洛夫院士、库库什金院士、鲍罗德金教授、谢伦斯卡雅教授、伊兹梅斯杰耶娃教授、戈里科夫教授、科什曼教授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为我们团队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卡尔波夫院士、米洛夫院士、鲍罗德金教授、谢伦斯卡雅教授、伊兹梅斯杰耶娃教授、科什曼教授和戈尔斯科娃副教授前来我校讲授俄国史专题，开拓了我们团队及俄国史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视野。卡尔波夫院士、米洛夫院士和鲍罗德金教授被我校聘为名誉教授，他们经常为我们团队的发展献计献策。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学者还经常向我们馈赠俄国史方面的著作。正是由于双方有这样的合作基础，在选择翻译的书目方面，很容易沟通。尤其是双方商定拟翻译的30种左右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者著作，需要无偿转让版权，在这方面，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从系主任到所涉及的作者，克服一切困难帮助我们解决关键问题。

五是由于我们团队有一支年富力强的队伍，既懂俄语，又有俄国史方面的基础，进取心强，甘于坐冷板凳。学校层面和学院层面一直重视俄国史研究团队的建设，一直注意及时吸纳新生力量，使我们团队人员年龄结构合理，后备有人，有效避免了俄国史研究队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问题。我们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颇有心得，严格要求俄国史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以阅读和翻译俄国史专业书籍为必修课，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必须使用俄文文献为主，研究生从一入学就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效果很好：培养了一批俄语非常好、专业基础扎实、后劲足、崭露头角的好苗子。我们组织力量翻译米罗诺夫所著的《俄国社会史》《帝俄时代生活史》，以及在中文刊物上发表的70多篇俄罗斯学者论文的译文，都为我们承担“俄国史译丛”的翻译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锻炼了队伍。

译者队伍长期共事，彼此熟悉，容易合作，便于商量和沟通。我们深知高质量地翻译这些著作绝非易事，需要认真再认真，反复斟酌，不得有半点

的马虎和粗心大意。我们翻译的这些俄国史著作，既涉及俄国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政治史，还涉及文化史和史学理论，以专题研究为主，覆盖的问题方方面面，有很多我们不懂的问题，需要潜心翻译。我们的翻译团队将定期碰头，利用群体的智慧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如单个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人名、地名、术语统一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译者将分别与相关作者直接联系，经常就各自遇到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向作者请教，我们还将根据翻译进度，有计划地邀请部分作者来我校共商译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尽可能地减少遗憾。

我们翻译的“俄国史译丛”能够顺利进行，离不开吉林大学校领导、社科处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东北亚研究院领导的坚定支持和可靠后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上下共襄此举，化解了很多合作路上的难题，将此举视为我们共同的事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恽薇、高雁等相关人员将此举视为我们共同的任务，尽可能地替我们着想，我们之间的合作将更为愉快、更有成效。我们唯有竭尽全力将“俄国史译丛”视为学术生命，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它、珍惜它，这项工作才有可能做好，才无愧于各方的信任和期待，才能为中国俄国史研究的进步添砖加瓦。

上述所言与诸位译者共勉。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2016年7月22日



## 目 录

第一章 中世纪晚期史料（新时代早期） .....	001
第二章 15 世纪末至 17 世纪上半期西欧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	007
第三章 新时代早期西欧国家经济的发展 .....	026
第四章 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体系的形成 .....	043
第五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德意志 .....	059
第六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瑞士 .....	103
第七章 新时代早期的天主教会 反宗教改革和天主教会改革 .....	121
第八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西班牙 .....	130
第九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尼德兰 .....	152
第十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意大利 .....	180
第十一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英格兰 .....	211
第十二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法兰西 .....	241
第十三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北欧国家 .....	272

第十四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奥地利 .....	294
第十五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 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	298
第十六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的国际关系 .....	324

## 第一章

# 中世纪晚期史料（新时代早期）

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革、新型意识形态的形成、世界图景本身的变化以及人类对它的接纳在史料的性质上也有所体现，因为这些史料诞生于复杂的现实并反映现实。在这一过渡时期，产生了与传统史料并存的新型史料。

与前一时期相比，流传至今的16~17世纪的书面文献数量要多得多。这说明了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生产进步、贸易增长，因为这些都需要公文资料的证明。这也说明国家功能变得更加复杂，活动范围更加广泛，文化水平整体提高，读书识字得到普及。印刷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极大地简化和加快了书籍及其他出版物的出版，增加了发行数量。16~17世纪文献的完好保存也说明了对文献保存态度的变化：档案业得到发展，国家和个人书籍收藏得以完善。

这一时期多数书面文献都是用本民族语言书写的。16~17世纪的语言规范与现代语言相近，极大降低了文献整理的难度。国际合约、外交公文以及君主、国务活动家和学者的信函中多用拉丁语，一些科学论文、历史题材作品使用的是拉丁语，天主教会的官方语言也是拉丁语。

公文资料占很大比重。公文处理的完善使西欧国家文件的形式极大简化并趋于统一。我们对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关系的印象主要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

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期，记录封建土地关系的传统文件仍和过去一样

广泛流行，如国家地籍簿、领地登记册（租册）、农民赋役登记册、村社条例等。但是，短期租赁合同数量增加，说明农民逐渐被佃户取代。租赁合同保存下来的不多，这是因为租赁有效期一般不长，没有刻意保存。资本主义早期农场主的私人公文保存下来的也不多，在农场建立与封建领地同样完整的公文体系需要时间。大量私人文书——土地买卖、典当、赠与、遗嘱、债务文书填补了这些空白，使我们能够追踪农村公社瓦解、早期资本主义元素分化、农村出现城市资本、封建特权阶层被摧毁、土地转移到新的所有者手里的过程。

我们对生产和贸易状况的印象也以文件资料为基础。遗憾的是，有关早期工场手工业的文件几乎没有保存下来。可以通过车间规程、国王颁给工匠的证书、股份公司合约、发明和新生产执照来了解有关发展水平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信息。交易和核算书，个人、商人和银行的商业信函、成员名单和特许状、许可证，贸易和交易场所的报告都反映了16~17世纪商业资本的发展历史。也可以从婚姻契约、遗嘱、死亡财产清册和纳税清单中提取有关收入水平和工商业资本增长的间接数据。

国家机关和部门——中央机关（皇家委员会、办公厅、国库、海军部、法院和审计署）和地方行政机关的文件中包含着最丰富的各类经济社会生活信息。16世纪下半期，教区登记簿中出现了民事（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记系统，稍晚时候世俗登记簿中也出现了民事登记系统。它们是人口、族谱和社会历史的重要信息来源。

在政治、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文件资料包罗万象、种类繁多。这包括君主、国家机关、皇家委员会、各阶层代表的文书（议会会议记录、议会的清单和记事簿）、官方信函、政治活动家的个人档案、地方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各类文件。国际关系史反映在合约文本、外交信函、君主个人信件、政府给大使的指示、驻外大使的报告中，16~17世纪，精通欧洲事务的威尼斯大使最为突出。

各级教会——从教区到罗马教廷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文件也非常丰富，包括教皇的信函和训谕、教皇使节和传教士写给罗马的报告、主教公会和大教

堂会议记录、加尔文派会议记录、教会法庭、宗教裁判所记录、禁书索引、宗教改革家和其他宗教活动家的咨文和纲领性文件。

在中世纪晚期，皇权作用明显增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极力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它反映为立法积极性加强，并在一些留存的法律中得以体现。在16~17世纪的立法中，调整经济——生产和贸易规章、进出口、海关税的规模和性质等方面的条例居于显著位置。因而国家开始承担之前行会、同业公会行使的职能，通过文书确定商品质量标准、种类和价格。这一时期的法律也反映了君主专制在农业和解决财政问题（有关税收、国债、军事、建设、船舶进港费等法律）、社会问题（不利于被剥夺的农民的血腥立法、劳动报酬法、贫困救济法等）等方面的实践。

在宗教改革时期，教会设置、宗教信仰问题成为世俗国家立法的对象。出现了确定皇权与教会新关系的法令（如英国的《至尊法案》，见第十一章）、确定国内某种宗教具有优先权的法令（如法国亨利四世的“南特赦令”，见第十二章）、追捕持不同政见者的命令（如西班牙和尼德兰反对异端分子的启事，见第八章、第九章）。在一些信奉新教的国家，甚至把确定正式信仰标志作为世俗权力的一种特权，并按相应的法令办理。罗马教皇、主教会议的决议也在法律之列。

由于这一时期文件资料数量多、内容充实，叙述体史料对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和部分政治史的作用有所降低。从叙述体史料中首先分离出来的是史学著作。这一时期过渡性的特征在一体裁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期，大量编年史仍在编写中，尤其是地区和城市编年史。但是带有科研成分的历史著作正逐渐取代按中世纪历史编纂传统编纂、对事实缺乏概括、天真地相信奇迹和天命论的编年史。这些著作的作者在作品中使用了文件资料，对史料进行了科学评论，从唯理主义的立场进行了论述。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占据着明显优势，早在14世纪就已经在此产生，并在法国和英国得到普及，而它的影响在西班牙和德国则比较小。

尽管 16~17 世纪的史学家关注的是本民族的历史，但他们的著作仍被认为是“通史”“世界史”（如阿格里帕·多比涅的著作可以作为通史的范例，从本质上说它是法国史）。H.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佛罗伦萨史》）、Φ. 圭恰尔迪尼的著作（《意大利史》）、Φ. 培根的著作（《英王亨利七世本纪》）、让·奥古斯特·德·图的著作（《我们时代的历史》）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均为文艺复兴时期珍贵的人文主义历史文献。这些著作的特点是作者全力领悟管理社会的潜在动机，像对待已经发生变化的政治经验一样对待历史。但是，倾向性和有时为了支持自己的政治集团或上层订购人的利益歪曲事实是这些作品政治尖锐性的反面，无疑，这降低了历史文献的可信度，但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这些作品也更有吸引力。

回忆录也在史料之列。16 世纪至 17 世纪上半期回忆录体裁非常丰富，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发掘人的个性、人的内心世界、高度评价积极的公民活动的结果。作者是回忆录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掌握着大量细节，而这些正是文件资料所欠缺的。历史人物的生动鲜活使回忆录具有特殊的价值。但是作为历史文献，回忆录也有一定缺陷：发生的事件不足为信，与大事年表有出入、对发生的事件存有偏见、夸大作者个人在所描述事件中的作用。大政治家的回忆录（如亨利四世的大臣苏利公爵、枢机主教黎塞留的回忆录）中都有些细微的篡改，这些作品都带有特定的目的，用来颂扬自己的政策和活动。需要吸收其他类型的史料对回忆录所强调的信息进行批判分析。同时，当回忆录被用作社会认知史料时，这些缺点反倒成了优点，因为这鲜明地反映了作者所属社会阶层的兴趣、兴致和政治倾向。

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行的日记在内容、性质上与回忆录比较接近。在某种程度上日记使我们有机会研究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心理特点、自我意识、个人存在感的生长，以及个人的社会政治追求。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出现了大量旅行者和航海者日记，它们确定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其中最可信的变成了研究殖民地的真正历史著作，当然，它们既包含了可靠的信息，也包含了虚构的成分。

在叙述体史料中书信体广为呈现。私人通信包含不少反映方方面面现实

的信息，包括日常生活、风俗和家庭关系。这类史料有助于我们研究当时大众思想和世界观。

印刷术的广泛流行带来新型叙述体史料——政论作品的繁荣。印刷机成为社会和政治集团强大的武器。印刷的小册子、抨击性小品、讽刺文章、常常秘密流传的传单淹没了欧洲。其中，主要是令当代人激动不已的对重大问题的激烈争论，如国家政策、皇位继承、社会改革计划、经济政治方案等。专制政体问题在思想斗争中占据核心地位，围绕这个问题皇室和君主的拥护者进行了辩论（其中最知名的讽刺小品为Ф. 奥特芒的《法兰克-高卢》和杜普莱西斯-莫内写的《控诉暴君》）。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在宗教问题上的斗争同样残酷。因此，政论作品是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期思想史上最具有价值的史料。

政论作品的发展为社会意识的觉醒做了准备，而印刷术为期刊的产生创造了技术条件。西欧最早报道社会政治事件的期刊为16世纪80年代于德国出版的《法比信使》（«Франко-Бельгийский Меркурий<sup>①</sup>»，英语为 *Mercurius Gello-Belgicus*——译者注）、17世纪上半期在法国出现的《法兰西信使》[«Французский Меркурий»，旧称《风雅信使》（*Mercuregalant*）——译者注]和《公报》（«Газета»）。

在叙述体史料框架内，论文占有特殊地位，已经可以将其归入科学文献之列。16~17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转折催生了许多著作，它们使之前积累的农业、物理、数学、化学、解剖学、医学、植物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知识系统化。当时的经济思想以有关农业、工业、贸易、金融、航海、殖民扩张的论文的形式呈现。

从经济史的角度，笔者对概括世代积累的耕作经验的论文有着极大的兴趣，它们对农业收入的提高有实际的指导作用，A. 菲茨格尔伯特、T. 台谢尔、O. 德·谢尔、A. 加仑的著作宣传使用定期租赁、雇佣劳动等农业集约

① Меркурий 在俄语中意为“古罗马神话中的商业保护神墨丘利（Mercury）”，由于墨丘利是众神的信使，于是他的名字便演变为“信使”。

经营方法和先进的组织形式。

在大量有关贸易的政论作品中，法国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Ж. 博丹和西班牙人托马斯·德·梅尔卡多以及萨拉曼卡其他经济学家的作品显示出较高的理论水平，他们最早发现欧洲“价格革命”的原因。提出了资金和贸易平衡理论的 А. 安东尼奥·塞拉、А. 蒙古莱田、托马斯·曼、胡果·格劳秀斯、彼得·格鲁特以及其他重商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用自然和社会发展法则进行科学思考的尝试催生了许多政论作品。君主专制的出现和实质、君主专制与人民的相互关系规则、权力的本质、君主主权与代表机关共存、“自然权利”与“人民政权”理论等现实问题成为多数政论文章的对象。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关注到了这些问题。Ж. 博丹的著作《王权论》《国家六论》、Г. 格劳秀斯在国际法方面的著作对此后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М. 蒙田和 Ф. 培根的历史哲学随笔也是另一类对人性和社会性质知识的概括。对理想的国家和社会结构的追寻使社会上乌托邦体裁的著作广泛流行，Т. 莫尔（《乌托邦》）、Т. 康帕内拉（《太阳城》）、Ф. 培根（《新大西岛》）是这类作品中的优秀代表。

这一时期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诗歌、歌曲、流行的讽刺小品也是珍贵的史料。



## 第二章

# 15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期西欧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时期划分问题** 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按照形成于本国科学研究的传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世纪晚期；按照欧洲历史编纂学传统，这一时期被称为新时代早期。这两个术语都强调这一时期同时属于两个时代的过渡性和极其矛盾的特点。深刻的社会经济进步、政治文化变迁、社会发展明显加速与许多回归已经过时的关系和传统的尝试并存。这一时期封建的政治经济体系居于支配地位，早期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正在其内部产生和形成，但是在欧洲发达国家这一进程发展并不平衡。在与人文主义流行、宗教改革过程中对天主教教义的重新认识、社会思想逐渐世俗化有关的世界观发生变化的同时，民众的宗教信仰也得到强化。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期反宗教狂热的声浪、血腥的宗教战争，与前一时期有着密切联系。

通常认为15、16世纪之交——标志着与中世纪的经济和精神割裂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繁荣时期——为新时代早期。欧洲人所熟知的人迹区的界限明显扩展，由于开发了新发现的土地，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宇宙概念有了重大变化，在社会意识中新型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得到肯定。

对封建主义晚期上限的界定存在争议。一些史学家依据经济标准，倾向于将整个18世纪都划入中世纪。另外一些史学家依据某些国家早期资本主义成分的成功，建议将与资本主义成分增长有关的社会政治大变动——16世纪下半期尼德兰的解放运动或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界限。